

慕尼黑

——悲剧的序幕

〔英〕约翰·惠勒-贝内特 著

林书武 沈芜清 译

金宜久 张启荣

陈京生 校

北京出版社

幕尼黑

——悲剧的序幕

[英] 约翰·惠勒-贝内特著

林书武 沈芫清 译

金宜久 张启荣 译

陈京生 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394,000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108 定价：1.65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约翰·惠勒-贝内特(出生于1902年)是英国当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多年来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现代德国史的研究，著有《裁军的僵局》、《木制巨人兴登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了的和平》以及《权力的报应》等书。

自从1938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事件到现在，已整整四十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此事件出版了许多论著，但约翰·惠勒-贝内特所著《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始终要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本书于1948年出版，1962年再版时未作任何修改，至今仍很受资产阶级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英语著作中有关[慕尼黑]危机的最生动、最有见解的说明”，^①为解释慕尼黑事件“树立了一个迄今未被超过的典范”。^②

《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之所以受到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普遍赞扬，就在于它以貌似公正的笔法，为绥靖政策作了十分巧妙的辩护。作者一方面谴责希特勒的侵略罪行，揭露他玩弄假和平、真扩张的诡谲伎俩；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绥靖政策似乎也予以指责，甚至直言不讳地承认英、法两个大国“把一个小国献上了奴役的祭坛”，指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更大悲剧的序幕”。在全书中，尽管作者对绥靖政策作了不少批评，但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把绥靖政策粉饰为“和平的政策”，把张伯伦、达拉第之流美化为“从灵魂深处爱

① B. 戴克斯特编：《外交事务五十年书目》(纽约，1972年版)。

② D. N. 拉摩尔斯：《解释慕尼黑》(斯坦福，1966年版)。

好和平的人”，是由于“轻信”希特勒而上当受骗的“老实人”。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需要，本书作者还把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外交政策与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等量齐观，肆意攻击社会主义的苏联。但是不论惠勒-贝内特如何费尽心机地为绥靖政策辩护，我们只要善于利用他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对之加以分析，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绥靖政策的反动本质以及绥靖主义分子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可耻下场。

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重演慕尼黑事件的危险。苏修叛徒集团篡夺领导权以来，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争霸，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在苏美争夺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表现得更为猖狂，它有孔就钻，到处采取攻势。勃列日涅夫正扮演着当年希特勒的角色。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西方有一股绥靖主义思潮，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还有人走张伯伦的老路，想把新沙皇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因此，现在来阅读这部书，重温当年慕尼黑的历史教训，对于揭露苏修搞假缓和真扩张的狰狞面目，对于进一步认清绥靖政策纵容侵略、挑拨战争的实质，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由林书武、沈芫清、金宜久、张启荣同志根据纽约 1962 年版译出，陈京生同志校订。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齐世荣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译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1978年3月

谨以此书献给
奥布雷和康斯坦斯·莫尔根，
 献给
伊萨伯拉·格林威·金，
 以表谢忱和友爱之情。
 由于他们的帮助，
 这本书才得以写成。

我们又得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然而人们却从不记取：千万别让陆、海军的力量削弱得那么厉害，以致于不得不很快就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第一流强国的地位——对此没有人能够怀疑——我们就必须同印度帝国和广大的殖民地一起，不断地准备在这里或那里发动攻击和战争。而且必须随时准备好雄厚的经济实力。

——维多利亚女王 1879 年 7 月 28 日致比康斯菲耳德勋爵①

这[慕尼黑协定]是五年徒劳无益的善良意愿的结果，五年孜孜以求的尽量不抵抗路线的结果，五年英国势力不断退让的结果，五年忽视空防的结果。

过去五年中，我们的安全地位一再被削弱。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安全地位是那样牢靠、那样不容置疑，以致我们从未感到担心。那时，战争一词被认为只有该进疯人院的人才会对我们使用，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

——温斯顿·邱吉尔议员 1938 年 10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

① 比康斯菲耳德勋爵，也就是迪斯累里（1804—1881 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作家，曾任英国首相。——译者

作者序言

当代史的作家们在两种严重的无能为力的状况下费力地工作着：他们往往太接近于他们要记述的事件，因而不能建立起适当的透视感；再就是他们从来不能占有全部有关材料。及至外交部的档案能为公众得到的时候，他们所透露的材料已不再是“当代的”了，而已经进入通常称为“近代”史的领域了。

我在写这本慕尼黑协定的历史书的时候，曾努力尽可能地弥补这两种缺陷。但我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主要困难一直是：一方面要避免受到过分的“事后聪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好象只是当一个卡珊德拉^①。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关于原始材料，当代史学家从纽伦堡审讯提供的文件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多亏德国官方头脑的从事记录的特殊才能，记录下来的文件又从未销毁，所以整个（德国）政府机器的档案才到了盟国手中。在纽伦堡作证时公布的那部分档案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比一个历史学家辛勤工作半个世纪所能积累起来的还要丰富。国际关系领域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应该感谢为历史研究作出了这一巨大贡献的四大国检察团成员，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我们现在已占有慕尼黑时期德国方面几乎全部的文件材料，而这些，从别的途径是无法得到的。我个人特别感谢英国组里的朋友

^① 据希腊神话，卡珊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被阿波罗所爱。为了赢得她的爱情，阿波罗授予她预卜吉凶的本领。在爱情被拒绝以后，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们所相信。——译者

们，特别是 H. J. 菲立墨上校和派特里克·迪安先生的许多帮助。

除了这一丰富的文件资料来源以外，由于贝奈斯总统和扬·马萨里克的极大的好意，我得到非常充分的机会查阅了这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档案。我非常感谢他们。

英、法政府在慕尼黑时期的记录仍有待于公布，但我设法弥补了这个缺陷，我亲自研究并询问了最有资格谈论那个重大时期绥靖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我深深感谢他们的善意和耐心，感谢他们的个人经历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我还应向那些允许我使用其笔记的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其中有哈罗德·尼科森阁下、保尔·艾姆利斯·伊凡斯先生和查理士·林白上校；我特别感谢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他的意见和帮助就象他的友谊一样那么忠实可靠。

我没有按照事件的年代顺序安排本书的写作，也未附和把慕尼黑时期严格定为从 1938 年 3 月到 10 月这几个月的说法。正如邱吉尔先生说的，慕尼黑协定，只不过是“五年徒劳无益的善良意愿的结果”，它本身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更大悲剧的序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叙述慕尼黑协定这一时期以内的历史；然后适当叙述在此之前的那“失去的五年”，以及在此之后的五个月；最后扼要叙述一下希特勒 1939 年春侵入布拉格以至六个月后大战爆发这段时间中发生的大事。

我要向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蒙达格·贝尔顿讲座的 E. L. 伍德瓦尔德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近代史的 L. B. 纳米尔教授致以最热诚的谢意。他们知识渊博，向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卓越的意见，并给我以友好的鼓励。我还深深地感谢评阅了全部或部分手稿的人，尤其感谢少将内尔·马尔科姆爵士、奥布雷·尼尔·莫尔根夫妇以及伊赛亚·伯林先生；感谢我的秘书巴格肖·曼夫人，感谢 P. E. 贝克夫人，由于得到她们的大力帮助，本书才能

完成，还要感谢穆里埃·克丽小姐给予的技术性的帮助。

承蒙皇家文书局允许我把曾作为政府刊物出版的某些文件重印作为附录，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同样允许我重印《国际新闻公报》和《国际事务文件》年度合订本中的材料，对这些慷慨的帮助，谨致谢意。

最后，我非常感谢德威特·莫罗夫人和伊萨伯拉·格林威·金夫人，感谢她们最慷慨的照顾和款待。

约翰·惠勒-贝内特

1945年2月—1947年1月

于墨西哥，库厄纳瓦卡；康涅狄格州，黑岩，牛津附近，
加辛顿庄园

补记

关于第394页注①和第412页注①（中文版第416页注③和第434页注①。——译者），美国国务院《1939—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材料公布时，本书已经校对完毕，因此我来不及利用那里面的文献材料。收在附录N中的《苏德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的条文，情况也是如此。

约翰·惠勒-贝内特

1948年2月

再 版 序 言

我很高兴地借本书再版的机会重申，我相信我在本书1948年初版时所持的观点。在这段时间内，许多新材料变得可以利用了：纽伦堡记录、英国外交部和德国外交部文件的有关各卷、以及大量的回忆录。这些材料对于补充叙述慕尼黑的细节来说，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在这同时我断言，这些材料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总的论点：

“我们不妨说，慕尼黑协定是无法逃避的。那时，英国的军备和防务都缺乏准备，国内和英联邦中又不够团结，法国人的士气衰落，俄国的作战能力不能肯定，张伯伦先生面对这种形势，除了象当时那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我们不妨对他的坚持性表示敬意：他坚持不懈地执行了一项他老老实实地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我们应该接受并且承认这一切，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不要忘记那羞耻和屈辱是我们的；我们应该记住，为了我们自己脱身——记住：因为我们软弱得不能保护自己——我们被迫把一个小国献上了奴役的祭坛。说什么我们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使之免遭我们的盟国波兰后来遭受的命运；说什么倘若没有慕尼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会象克拉科夫、罗兹和华沙这些省份那样受蹂躏，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用处的。事实上正是捷克人挽救了我们，因为，如果贝奈斯总统选定在俄国的支持下打仗，从而引起一场东欧战争，那就不能想象英国和法国能作壁上观，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也会被迫参战。”

我仍然认为：这个论点反映了对慕尼黑事件的真正评价。

自从本书初版以来，在这些年代里，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于慕尼黑协定的前因后果在世界历史的最后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作了估计和再估计。在这些“令人极度痛苦的重新评价”中，最近的当然要算 A. J. P. 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了。这是一本才气横溢的、挑衅性的、引起争论的、并且据我看，危险地把人引入歧途的著作。不管我们对泰勒先生扰乱人心的论点感觉如何，不管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论点，但是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重新检查这个事件的证据，这样做，只能是有益的，对此，我们不能不感谢他。在感谢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和泰勒先生有分歧而毫不后悔。我不能接受——根据所述的事实——说希特勒冒失发动了战争的论点，不管这个论点可能出自多么著名的来源。在证据中我找不到任何东西，使我离开下述观点，即：早在 1937 年 11 月，希特勒就已制订了计划，明显地设想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希特勒的计划并未排除有意冒世界大战的风险。我感到骄傲的是：这个观点，是我和已故的路易·纳米尔爵士所共有的。很凑巧，泰勒先生和我本人都大大得益于他。

由于本卷是原书的再版，而不是修订版，所以我不能引用出现的新材料，也不能补充。但是我觉得必须提醒有兴趣的读者注意到最近完成的两部特别重要的著作。第一部是艾伦·布洛克的《希特勒：暴政的研究》（修订版）。这本书作为“鹈鹕丛书”的一种正在出售。布洛克先生原著被誉为卓越的研究著作。在这次新版中，他充分运用了新的材料来源，使他的控诉更加扣人心弦、更加不可辩驳。这方面题材的书，没有比这本更有价值的了。E. M. 罗伯逊先生也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他所著的《希特勒的战前政策和军事计划》一书将由朗格曼公司于 1963 年出版。罗伯逊先生不但利用了这个时期出版的主要著作，而且也利用了许多当代

的原始材料，从而写出了具有巨大价值的研究作品，表达了他所获得的罪证。

我认为，对那些严肃的历史学者来说，读了这两本书很难得不出下述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希特勒不仅犯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而且也犯有积极策划在某个时期对东方以及对西方进行潜在侵略的罪行。在犯下战争罪行的历史中，慕尼黑插曲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因素，因为正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会谈中，希特勒第一次把他的意图清楚地告诉了西方大国。他的意图是：如果必要的话，使用武装力量来作为修改条约的手段，而不管这样使用武力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一定要在1938年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对于这一点，他毫不否认。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准备冒战争的风险的。一年后他入侵波兰，情况也是如此。在侵入波兰的时候，他蓄意置根据英法同盟条约给予该国的保证于不顾。他宁愿和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一场双边战争，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准备着爆发一场大战的可能。

约翰·惠勒-贝内特

1962年12月

目 次

作者序言	1
再版序言	1

结论：关于绥靖的一些意见

第一部分 慕尼黑这出戏

(1938年3—10月)

第一章 灯光渐暗	11
第二章 三次转折	47
第三章 布拉格序曲	63
第四章 慕尼黑这出戏	99
(一) 纽伦堡的开场戏	99
(二) 第一场：伯希特斯加登	110
(三) 第一场幕间戏：布拉格	125
(四) 第二场：戈德斯堡	136
(五) 第二场幕间戏：伦敦、巴黎、布拉格和柏林	147
(六) 第三场：慕尼黑	182
(七) 尾声：伦敦、巴黎和布拉格	194

第二部分 五 年

(1933—1938年)

第一章 沉睡的欧洲	217
第二章 德国是怎样既没有打瞌睡，也没有睡大觉的	229

第三章	英国和法国是怎样时醒时睡的.....	244
第四章	俄国是怎样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	290
第五章	波兰是怎样在睡梦中走路的.....	299

第三部分 五个月

(1938年11月—1939年3月)

第一章	绥靖政策的“黄金时代”.....	309
第二章	“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	350

第四部分 觉 醒

(1939年3—8月)

第一章	有耐心的人们的愤怒.....	371
第二章	俄国之谜.....	410

尾声 在威斯敏斯特

(1942年8月)

附 录

A.	法捷互助条约(1925年10月16日).....	461
B.	法苏互助条约(1935年5月2日).....	463
C.	苏捷互助条约(1935年5月16日)	468
D.	伦西曼报告(1938年9月21日)	470
E.	英、法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的建议(1938 年9月19日).....	477
F.	捷克斯洛伐克的答复(1938年9月20日)	479
G.	戈德斯堡备忘录(1938年9月23日)	482

H. 捷克斯洛伐克的答复(1938年9月25日)	485
I. 慕尼黑协定(1938年9月29日)	488
J. 英法建议、戈德斯堡备忘录、捷克斯洛伐克的评论、慕尼黑协定主要条款的比较.....	492
K. 英德宣言(1938年9月30日)	500
L. 法德宣言(1938年12月6日)	501
M. 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	503
N. 苏德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1939年8月23日)	505
O. 联合王国和波兰互助协定[附议定书](1939年8月25日)	507
文献目录.....	512

绪 论

关于绥靖的一些意见

3

弗里德里希·根茨^① 1797年给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威廉三世的信中曾这样写道，“避免战争应该是治国之才的最高抱负”，从而概括了一条原则。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在一个历史性时刻曾经说过：“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我们在从事战争之前，必须弄得很清楚：那个处于千钧一发之中的问题，确实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如果说，这些话有任何正确性的话，那么，它的正确性在 1947 年就比 1938 年更加清楚得令人难受了。

由此，绥靖、怀柔——当我们同对手狭路相逢时对他让步——就成了所有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因为这是我们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而文明秩序，又是那种外交活动所坚持和发展的目标。但与此同时，除了严格的和平主义社会之外，任何社会为了自卫而使用武力无论如何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因而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动摇于这明显对立的两极之间。

那么，为什么绥靖得到了它今日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生厌的含义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单方面的政策行动，而与双方同意的协议不同，双方同意的协议则意味着各方都对另一方的观点有所让步。然而这种解释看来并不完全恰当。各国政府为了奉行某种政策也可以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不管那种

① 弗里德里希·根茨（1764—1832 年），德国的政论家、外交家。曾任奥国宰相梅特涅的亲密顾问。——译者

政策的原则是什么。但是这样的让步决不是放弃任何基本原则，而各国政府，就是要依靠坚持这种基本原则才能要求人们对它忠诚和尊重。放弃这些原则，就算是贬义的“绥靖”了。这样说是很恰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手段公开地或隐蔽地背叛了要求它们去促成的目的。向讹诈投降总是糟糕的，因为这样做，就是把单纯保护自己看得比原则还高。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原则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种绥靖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谴责，因
4 为这使我们感到，这是一种背叛我们的一切主张的行为——牺牲那些最终目标去换取生命，而生命之所以活得有价值仅仅在于对这些最终目标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自尊心的人受到钦佩，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绝不会同意出于权宜之计而牺牲原则。

在过去几百年中，人们就曾为了保卫和传播他们的宗教信念，为了他们的君主的王朝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持或者扩充他们的财产等等这样的一些目的而热情地进行战争。但是，随着现代战争逐渐向总体化发展，文明民族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要诉诸于武力裁决的问题限制到最小最小的限度。

从这一倾向就发展出一种迫切的希望，切望“和平变革”，切望找到某种不诉诸战争而能解决国际争端的办法，因为战争总是带来人类生命的牺牲，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以及荒芜、疾病和死亡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与这种进展并行，还有一种渴望，急于在武装冲突真的发生时，根据“参战国家越少，结局的破坏性就越小”的原则，把武装冲突局部化而且加以隔离。

在维也纳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爱好和平的种种倾向结合在一起，结果使欧洲在后来的百年之内得以避免发生大战。诚然，确实发生过一些局部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卷进去的国家是较少的；但是也曾有许多次，那时有些在过去本来会引起战争的问题，却通过仲裁或者外交绥靖的办法得到了解决；还有一些问题，用和